



科技開拓新徑 國學文化再盛

探古人「朋友圈」 深化史學「三度」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亦是時代的召喚。成長於信息時代的新學者們，正探用科技擴展人類對歷史認知的維度、深度、廣度，用別出心裁的視角，激發更多人對國學、歷史的興趣。不知你有沒有好奇過家喻戶曉的詩人李白、杜甫曾經生活在怎樣的朋友圈中？香港土生土長的歷史學者徐力恒所研究的領域——數字人文，正打開這種走進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新途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靖

許多人對歷史的認知停留在中學的課本，應付了考試，便不再有探究歷史的熱情，而倘若願意將歷史作為專業，則更被視為是少數人「瘋狂」的選擇。北京大學學士、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徐力恒正是這樣一位「瘋狂」人物，在香港讀中學時期，被數名歷史老師的生動教學激發了學史的热情（見另稿），並一路求學鑽研，逐步成為中國史學者。在多年研讀經驗及與人分享得着的過程中，他深刻意識到，要讓更多年輕人愛上歷史，「激發興趣至關重要。」

在互聯網時代長大的徐力恒，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研究是他的專長。這種利用電腦計算技術進行人文研究的新興領域，在他眼中是未來歷史學者都需要掌握的課題。

他認為，數字人文表現方法現代，在網絡時代易於傳播，並且可以幫助完成許多瑣碎的整理事務，不僅提高效率，亦可能提供許多有趣的研究新視角，例如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李白、杜甫的「朋友圈」如何等等，讓人明白歷史研究不是「老古板」，研究歷史亦可以加入與時並進的元素，讓大眾更容易找到歷史的樂趣。

結合科技革新 改變刻板印象

面對國學相關學科逐漸被邊緣化的現狀，徐力恒指，不少文學者具備很強的能動性，他們不斷思考如何應對和利用媒介的轉變、科技的革新，嘗試與其他學科合作重新探討國學中的歷史課題，使用以往未用過的理論工具，不過徐力恒認為，這些並不會令國學驟然成為主流。

但他續指，新的方法仍或改變一些人對國學的刻板印象，在社會層面開始引起更多人的興趣，而了解是讓更多人可能愛上國學的第一步。

修國學展興趣 皆須保持平衡

浸大饒宗頤學院院長陳致則表示，對國學來說，社會要分清學術研究、教學，以及於大眾層面提高國學修養，「界限清晰才能健康發展」。他表示，在大眾普及層面，對比香港一直較淡的氛圍，內地近年有不少家長對國學興趣濃厚，積極讓子女從小接觸，甚至有個別人士要求孩子脫離現代教育體系，以「全情投入」國學之中。

陳致強調，學習國學雖是好事，但畢竟孩子生活在現代社會，不能只對國學有興趣，否則走了「另外一個極端」。他認為政府應多做一些國學普及工作，例如推動中小學多開設國學興趣班，但同時要保持平衡，「引導孩子多讀一些（國學相關）書，亦要讓他們有一些自由發揮的時間會更好。」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認為，在國學普及方面，應該利用資訊科技及人工智能等現代先進技術，以年輕人樂於接受的方式介紹相關知識，而傳統的實體國學書籍，表達上亦應圖文並茂，讓年輕人易看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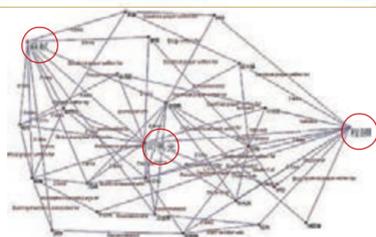
他自己今年中亦出版了一本針對年輕受眾的《國學大師饒宗頤的人生智慧》，期望用深入淺出方式把年輕一代帶入奧妙的國學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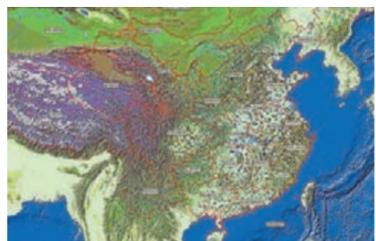
徐力恒
曾參與BBC紀錄片《中華的故事》的製作。受訪者供圖



有人雖非研究人員，但亦在為國學復興獻力。圖為饒宗頤學術館工作人員修繕保存饒公手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以「數字人文」可以分析不同歷史人物學薦、共遊書信往來、撰輓、師生關係等實質記載資料，能夠重組古人的「朋友圈」網絡。圖為追蹤北宋文學家蘇軾與理學家程頤一重重聯繫情況，揭示了史學家司馬光於當時社群中的「中間人」角色。
CBDB簡報圖片



利用「數字人文」概念，可以將歷史人物結合空間統計資訊呈現新的研究方向。圖為「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中，按已知籍貫的67,000名中國歷史人物的地理分佈圖（黃點）。
CBDB網站圖片

用好數字人文 助力查詢分析

「數字人文」興起於千禧年前後，徐力恒有份參與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可說是其中最受重視的中國歷史相關項目之一。CBDB由哈佛大學、北京大學及台灣「中央研究院」共同開發，致力於系統地收錄中國歷史上所有重要的傳記資料，並開放數據供學術研究使用。

CBDB初版源自美國著名漢學家郝若貝（Robert Hartwell）畢生所收集的中國歷史人物數據庫，自1995年起交由上述3個研究單位的中國史專家學者進一步增錄開發，至今年9月共收錄自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約422,600人的傳記資料。

當中所收錄的數據，除可用於全文檢索，還可以作多樣查詢和分析，並導出到其他電腦軟件，以便批量處理，或用統計數據、電子地圖、可視化圖像等不同的方式呈現。例如按歷史人物籍貫展示地理分佈圖，或依籍貫分析明代歷屆進士之歷史變遷等，幫助人文學者更有效率、更系統全面的解決學術問題，以及發掘新課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華文圈重中庸 邁國際影響深

除國學領域研究手段的現代化外，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與外界文化交流的增多，亦讓更多人樂於走進中國文化。港大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深信，「在全球範圍內，中國文化將來會有一個相當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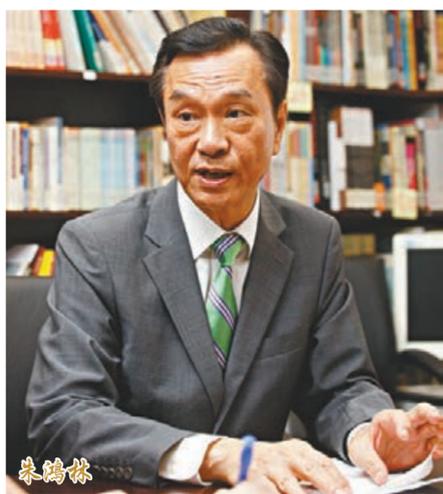
他表示，很多歐美國家科技文明進步，但物質和精神失衡，大家都希望盡量利用地球有限資源追求最大的利益，而中華文明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很重視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重視精神物質的平衡。」

他又引述很多著名的歷史學家，例如英國的湯恩比、羅素，他們都覺得21世紀，是一個中華文明引領世界向前發展的一個時代。

李焯芬的兒子成長在美加地區，當年他和港科院院長徐立之都選擇送各自的兒子去當地孟嘗會中文學校學習中文，後來二人又落腳推動海外華人子弟和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外國學生學習中文。現在李焯芬兒子成家立業，亦會安排子女進行中文學習。

理大香港孔子學院理事長朱鴻林則認為，粵港澳灣區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影響範圍很大，中國人要向外界接觸更多，國學、歷史肯定會更加重要。

遇良師奠基礎 立大志展新意



朱鴻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老師的視野、情懷或會影響學生一生。香港孔子學院理事長朱鴻林投身國學發展之路，與數位老師的點撥不無關係。有老師在他年少時便常教導他要「明一代興廢之跡，考典章制度之變」，讓他明白史學之功用，並為未來精研史學立下大志，也打好基礎。

朱鴻林回憶，自己中學時開始寫律詩，其中文老師之前正巧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學社團南社的詩人，可以為他青澀的作品點評一二，培養了他扎實的文學基礎。

而他學史之路更是遇到良師無數，中學時，有老師教導他讀史之一大功用是「要明一代興廢之跡，考典章制度之變」，而非着眼考試，這有助他日後奠定自己的歷史

觀。之後一路在歷史學科深造，他又師從漢學泰斗牟復禮、香港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慢慢摸索出方向，就是「對明朝很有感覺」。

朱鴻林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求學，其間在大學屬下的東亞綜合圖書館——葛思德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博覽群書，那裡藏有世界聞名的十萬兩千卷珍貴線裝中國古籍，同學可隨意取閱。今日的朱鴻林回憶當時的情景，仍然十分興奮。

知本國歷史 作有識國民

對於歷史發燒友，再晦澀難明的書籍都是珍寶；而針對普通學生的歷史類書籍，他則希望題目不要老舊，並做到言簡意賅，給人想像的空間，文從字順，圖文並茂。

新一代中國史學學者徐力恒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除了父母在他兒時給他啟蒙外，高中四位歷史老師生動的教學亦給了他很大的力量，「換成其他老師和課程，可能會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當時中學生都面對公開考試，但歷史老師會讓他明白除了考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鑽研，「有位老師在新學年第一課，引用錢穆《國史大綱》的卷首語：『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個有知識的國民。』」

他認為這觀點雖有爭議，但也值得深思，這句話也激勵他，要讓自己看得更多更廣。